

16

塔城市文史资料



编辑组长：姜德山

付组长：托乎塔生

责任编辑：陶明山

安绳武

编委：张建国

阿不勒哈克

安常荣

邢治平

白连成

王树林

封面设计：陈明群

韩志强

目 录

塔城市回族的来源发展和斗争史的简述

..... 安绳武 (1)

关于锡伯族的渊源关系及其西迁的历史简况

..... 黄秀芳 (8)

达斡尔族.....达林太 (16)

塔尔巴哈台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概况.....张建国 (22)

略谈塔城庙宇、会馆、清真寺兴建始末

.....邢治平 (31)

楚呼楚——塔城的来由.....安常荣 (38)

沙皇俄国侵占塔城边界国土简述.....安常荣 (43)

简述塔城建国前工商业发展的概况.....邢治平 (50)

回忆建国前塔城文体活动的点滴.....邢治平 (58)

清代塔尔巴哈台卡伦设置略谈.....党 彤 (63)

简述塔城市的文化沿革.....白连成 (65)

关于塔城市历史文物考略之一.....白连成 (70)

关于一棵树的传说.....白连成 (72)

塔城的龙眼泉和两幅对联.....白连成 (74)

从塔城参赞汪步瑞搜集的一组民谣说起

.....白连成 (75)

三区政府在塔城建立政权前后的历史片断

.....安绳武 (79)

塔城市回族的来源发展和斗争史的简述

安 绳 武

回族人民是勤劳勇敢和富有智慧的人民，由于回、汉杂居和使用汉语文字，给回族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了便利条件。一九八六年塔城总人口十万零四千七百九十人，其中回族七千三百三十九人，占人口数百分之七。现将回族来塔城市的情况简述于下：

最早来塔城市的回族，多是随军当兵，采矿，挖金和种大烟的，而且大多数是单身汉，从陕西、甘肃来塔城的较多。当然也有少数来塔城屯田种地，逃荒谋生的，其中有少部分是带家属行医，祖传接生，给小儿治病的；有的单身汉后来与哈萨克妇女婚配后定居塔城从事农牧业生产，还有一部分随白彦虎逃到沙俄，后来回国，少数在塔城定居。有百十户，从事小商贩，手工业，开饭馆，多数流散乌鲁木齐、伊犁等地。

建国前夕，塔城有回族八百一十四人，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回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样在政治上翻身、在经济上得到发展，出生率逐年增加。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一九六零——一九六二年，从甘肃、宁夏、青海、河南等地自动来塔城的回族截止一九八六年已增加到了七千三百三十九人（不包括兵团）。

建国前，回族教育方面总的情况是在农村子女受宗教影响很深。从小必须要念经文，有的读维、哈文，有的少数子女在汉语学校学习知识。礼拜寺有一个回族班，授汉语语文课。建

国后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改变了旧观念，从而使回族子女进学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据统计全市现有回族子女上小学的有一千四百三十三名、上初中的有三百八十四名、上高中的有四十名、升大专院校的有十名。

塔城市回族民俗。回族通用汉语文字，其语言基本上保持西北各省回族地方语言的特色。并夹杂有当地的方言和少量的阿拉伯、波斯术语以及维吾尔、哈萨克词语。散居在城镇的回族人民穿戴基本上与汉族相同而各有区别。在回族聚居的城乡男子多戴白色小帽，老年妇女头上蒙白色盖头或头巾。饮食方面，食肉只限于牛、羊、驼、鸡、鸭、鹅、鱼。其中除鱼以外，自死的、未流血的以及未经一定形式宰杀的都不能吃。禁食猪、驴、骡、狗等肉，马肉一般也不吃。此外暴目的、鉅齿的、吃生肉或相食的凶禽猛兽以及禽兽血也在禁食之列。回族的饮食具有自己的特点，如清汤羊、牛肉面，肉汤、蒸肉、粉汤、凉粉等独具风格。家庭饮食一般以拉条子、拌面、揪片（汤面）、蒸馍和香豆子花卷为主。婚丧事，一般都要自制油炸饼（油香），做羊肉粉汤招待客人。

回族人民喜欢饮茶，主要喝砖茶，红茶等，多用盖碗。招待客人时，一般还要在茶里加上白沙糖或方块糖，有时还加红枣和核桃仁。

在婚姻方面。建国前农村老户和哈萨克婚姻一样，城市老户和乌鲁木齐等地一样。婚姻经人介绍，同意结亲时，仍要派媒人去女家提亲，送去四色礼品（糖、茶，核桃，红枣各一包）各叫开口礼。若留下礼品，则表示同意，若退回礼品，则表示不同意。

亲事说定后，便择日定婚，送大礼会亲（双方家长互相邀请），最后订日完婚。结婚时请阿訇念“尼卡哈”。建国后虽

稍简便，但除领结婚证外，还要请阿訇念“尼卡哈”请客收礼。

回族实行快上葬。一般是晨亡午葬，晚亡次晨出葬，停尸不超过三天。入殓前要念经“着水”（洗尸），一定要由同性别的人洗尸身，然后用大小两块白布（叫“开比”女性一块）裹身，最后将亡人移入“塔布匣子”（又称“者纳子”清真寺里的公用抬尸木架），送葬者履行葬礼仪式，向遗体告别旋即抬往坟地。坟坑深约两米，直坑廊西壁再挖一个偏窖洞（热提），上方为圆形，高约一米，长可容体，将亡人头朝北向西放在偏窖洞后，用土块封好洞口（热合提门），然后填平直坑，地面用土堆成鱼背形坟堆。入葬时亲属不准啼哭，妇女不许进坟地，妻子不得扶灵送葬。安葬后第三天，头七、二七、月斋、四十天、百天、周年，一般群众都在家里念“索儿”（经文），表示对死者的纪念。每逢民族传统节日，亲人要去上坟念“索儿”不许填土。

回族酷爱养花，许多回族人 的 庭院中繁花似锦，屋内栽养盆花。

回族人民注意礼貌，热情好客，尊老爱幼，讲究卫生。同亲戚朋友和相识的人见面要道安问好。饭前、便后要洗手。室内外保持整洁，尤其重视水源卫生。

建国前，信奉“老格底木”，宁夏有极少数人“北庄门宦”，是石金斗阿訇遗留下来的。并无礼拜寺。但在——一九六——一九六二年自动来塔人员，将各门宦派带来塔城。比较有影响的“依赫瓦尼”教派在塔城最显著，有市二工乡头工东村和二工村都有礼拜寺大约三百多户。还有恰夏乡恩喀德克村一百户，全市共有二十六个回族礼拜寺。大部分属“老格底木”，依赫瓦尼教派主要分布在农村。

塔城市回族清真寺“老格底木”历史悠久，有代表性，它
在同治三年（1864）建立在塔城市文化路工业街（现地毯厂）
附近，因市区变迁，迁移到新华路（现市税务局）建于光绪十
五年（1889），后于一九一六年，马福明副将（协台）来塔
后，认为清真寺在城皇庙附近不适宜礼拜，也为了建立自己的
公馆，于一九一八年迁至饮马巷新建清真寺（现向阳旅社），
从一九三三年马赫英进入塔城后，失败逃跑时，因当地回民害
怕被官军杀害，逃于苏联，这时清真寺大殿被拆毁，事件平息
后，回民陆续重返祖国仍在寺院平房内作礼拜。至一九四七年
三区革命时，回族群众集资重建清真寺（现在地址），一九八
四年又进行翻修，并改为塔城市清真寺。

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四更时在贸易圈附近聚集了五、
六百回、汉等各族人民以回民矿工安玉贤、徐天尧（均系陕西
回民挖金矿工），用苇子点燃草堆，正巧风大，火借风势，瞬间
即成熊熊大火，越烧越旺，沙俄在贸易圈五十间栈房、住房
以及屯积货物几乎焚烧殆尽，领事和商人们狼狈逃至巴克图。
这就是塔城各民族为了捍卫祖国神圣主权，并替被杀死的矿工
报仇，以回族矿工为首的愤怒焚沙俄贸易圈的斗争震动了全国。
当时清朝政府卖国求荣的官员镇压了矿工带头人，由于矿工们
失去了带头人，斗争力量渐趋松散。

塔尔巴哈台回民，在同治二年（1863）和同治三年
（1864）上半年曾经两次酝酿起义，都被当地掌教阿訇石金斗
破坏。石金斗因此得到清政府的赏识，先后给以六品顶戴五品
顶戴。八月（七月）中旬，回民二百余人聚集城外起义，又遭
驻防之署理游击米庆捕杀驱逐。同治四年正月初一（1865年1
月27日）春节时，苏玉得又名包日巴图等领导回民及哈萨克人
民攻入城内，起义爆发了。石金斗、米庆眼看不能扑灭起义

队伍、自己身家难保，立即摇身一变，钻入群众队伍。才设计以谈判为名，诱杀参赞大臣锡霖等人，而窃取了领导权。后由于得到达尔木图金厂总头目刘广厚及蒙古族喇嘛棍噶扎勒参赞的大力协助，清军得以在塔城据守一年。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1866年4月1日）回、哈人民再次攻入城内，清朝政府在塔城的统治机构被摧毁。因自知力量单薄在六、七月（五月），回族人民撤出塔城，南下库尔喀喇乌苏，与妥得璘会合，塔城为棍噶扎勒参（又名金喇嘛）所占。起义失败主要是掌教阿匄石金斗、王官米庆，掌握了领导权。他们都是站在清朝政府统治者一边的人物，又因起义人员感到力量单薄等各种原因而终于起义失败。

光绪四年（1878）白彦虎残余从北疆各地潜逃到伊犁，被沙俄收留，同年八月这伙残余骚扰塔城，造成了民族间互相仇杀。失败后逃入沙俄边境，剩下妇女被杀或被清军及民团收入配偶。事件平静后，跟随白彦虎逃入沙俄的回民一部分回国在塔城居住。

民国二十二年（1933）马赫英率部队，清晨就从和布克起身，急速行军，未到中午即达额敏县。进入额敏后，既没伤人也未动一草一木，老百姓和往常一样平安地从事各种经营和劳动。下午他们又从额敏县出发直奔塔城，天亮前抵达塔城街，驻扎在老城内。此时新城已住满了各机关的公务人员和汉族老百姓，马赫英未打一枪，就占领了塔城的老城，并受到当地穆斯林封建上层人士的欢迎。

马赫英为迫使塔城官吏屈服于自己，便通过苏联驻塔城领事馆派员和塔城官员谈判。当时塔城县政府当事人声称：“如果马赫英占领了迪化（现乌鲁木齐），我们可以服从”。就在谈判的当天，苏联给苏驻塔城领事馆运来的十二车货物，全部

被马赫英抢劫。马赫英对车夫说：“你们想待在塔城就留下，不想留就走！”车夫中只有一名哈萨克族人留下了，其他车夫赶着空车返回苏联。由于马赫英的这一抢劫行为，激怒了苏联领事馆。

马赫英没有得到塔城县政府屈服于自己的答复，而大为恼火。马赫英声称要武力对抗官吏。除马自己的部队外，并在当地招募了回族青壮年六百多人。并勒令木匠赶做云梯，准备第二天拂晓前攻城用。就在攻城的当天夜晚，维吾尔族绅商阿西木商总带领一些群众对回族士兵们说：“你们都是穆斯林，我们也都是穆斯林。愿望都是相同的，你们远征而来，都很劳累，哨卡由我们看守，你们好好休息”。回族士兵相信了他们的话，尽将城墙附近的哨卡让给了维吾尔族群众看守，而他们乘机把东北军和归化军由赫劳夫斯基团长带领并有汽车二十辆，放进了城。同时在城墙附近的交通和耕地里挖了深壕沟，然后灌进了水，由于当时形势紧张，这一紧要情报未能即时向马赫英透露。因而在拂晓，马赫英的六百精兵开始攻城，有的战士拿着汽油烧毁了城门，城门起火时，战士们急速往城上冲杀，口喊：“杀！杀！”，有的士兵头顶铁锅往城上冲杀，首先上城的士兵被城上的机关枪扫射毙命，死了很多人，一部分士兵见势不妙往后撤退逃了。参战的士兵因对当地的地形不熟悉，掉在水沟里的人不计其数。马赫英的六百精兵在这次战役中大部分被歼灭。马见势不妙，将剩下的士兵调转头向老城安营，这时天快亮了，新城的归化军又向老城炮击。城内的回族老百姓惊慌失措，逃的逃，避的避，顿时炮火将老城城门封锁了，一部分人被围困在老城内。

马赫英为了重整旗鼓，破釜沉舟，并把逃跑的士兵拦阻回来，重新组织兵力，反击占领城门的归化军，归化军又开始向

新城退却。马赫英救出被归化军围困在城里的士兵和回族老百姓，然后往额敏县方向转移。负伤的士兵大约有四十多人，未能即时把他们转移，后被赫劳夫斯基全部打死。

在马赫英撤退转移时曾派了两名士兵查看地形，他们两人埋伏在财神庙（现一校）附近的馕房子内观察情况，正巧遇上赫劳夫斯基骑一匹白马搜街，即时用枪打中赫劳夫斯基的头部毙命。归化军向这两名回族士兵围攻时，回族士兵冲出围攻与大批逃兵一起打退了归化军，并夺走了归化军的两挺机关枪而逃出塔城。

当地回族因被官兵到处搜查。为此，大部分回民四处逃难，有少数被官兵抓到后杀死，其余逃到苏联境内避难。事件平息后，全部回民回国与家人团聚，参加各项生产劳动。

以上事件，给当地回族人民造成了经济上很大的损失，大批劳动者流徙散亡，尤其是白彦虎、马赫英不但在经济上造成了塔城回民的损失，而且在民族团结方面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形成了互相仇杀的残局。

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的团结才得到了发展，以至今天各民族之间的互助友爱。

一九四五年三区革命时，民族军进入塔城镇后，回族人民由于历史上的惨苦教训，不予参加征任，经过宣传动员，大部分青年被征入伍，参加了乌苏战役等，编为三区民族军回族团，镇守玛纳斯大桥。建国后这批青年陆续复员参加了土改工作，后被分配到党政等机关工作，有些还担任了县处级领导，为祖国做了一定的贡献。

关于锡伯族的渊源关系及其

西迁的历史简况

黄秀芳

勤劳，智慧，勇敢，善战的锡伯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关于锡伯族的渊源关系及其西迁的历史，有不少资料作了介绍。而我们这一代人根据自己的所得众说不一。例如锡伯族的来源问题，据悉，多年来中外学者将锡伯族列入满洲族的一支进行研究。

根据沈阳文史馆白友寒编写的锡伯族源流史纲记载：锡伯族人早期居住地，是海拉尔以南洮儿河、绰尔河流域。而最早的发源地则是大兴安岭北段今呼伦贝尔盟地区，这里本来是拓跋鲜卑祖居之地。拓跋鲜卑的贵族在黄河流域建立北魏王朝的时候，他们的遗民仍在这里守护着嘎仙洞祖庙石室。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些生活在深山密林以渔猎为业的遗民，逐步发展为室韦部族，其中南室韦，正是活动在海拉尔以南地区的室韦部落。因此，我们认为锡伯族的远祖是拓跋鲜卑，而近祖则是南室韦。契丹以北绰尔河，洮儿河流域的室韦（即南室韦），以狩猎为主，亦有从事耕种，由于种植粮食作物又出现了酿酒业，其经济基础比其他各部室韦较优。然而其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到明末清初，考察锡伯族的经济生活，仍以狩猎为主。

锡伯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即“吉普西语”，同乌桓鲜卑、契丹、室韦一样，属阿尔泰语系原始蒙古族语，到了南迁编入满族八旗之后，锡伯族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

锡伯族有独特的饰物，这就是雕镂瑞兽的腰带，即所谓“鲜卑部落带”，显然是从其远祖鲜卑那里继承下来的。

锡伯族婚姻风俗，显然同鲜卑的“嫁女娶妇瓮头饮”契丹人的“拜奥礼”等有着悠久的渊源关系。锡伯族的婚礼一般举行三天，头一天早晨男方派专人驾车将礼酒、肉、面等送往女方家，老人们为之送行，预祝顺利。女方则邀请亲戚朋友光临婚礼，第二天，女方设宴招待四方宾客。男方则杀牛宰羊做准备，并邀请亲戚朋友光临婚礼。当晚新郎的男朋友溯至新娘家举行近亲晚会，由奥母（锡伯语阿吾德儿额娘）奥父（锡伯语阿吾德儿阿玛）。汉语意为近亲母和近亲父主持，称之为“打丁巴”。在对歌对舞中，男方“打丁巴”的人决不能输，输了就被女方的人观笑。第三天男方招待宾客，并由新郎准备喜蓬车陪同奥父奥母去新娘家迎亲。新娘则梳妆打扮，整理嫁妆。喜蓬车一到，由奥母主持认女婿，给岳父岳母敬酒，然后说明“来由”，这时新娘的父母姑舅为了活跃气氛和提高女方身价，多方挑起“事端”，以拖延时间，让奥母奥父唱歌跳舞，经多次求情才让新娘乘坐喜蓬车和送行的朋友们一道去婆家。按照风俗，喜蓬车不能停留，有将军过路也为喜蓬车让道之说，并禁忌和其他喜蓬相遇。而新娘的嫁妆必须在新娘来到之前先行送到婆家，嫁妆历来都很讲究，人们多从嫁妆评价新娘子手艺的巧拙。新娘一上喜蓬车，便用喜帕蒙头，到了新郎家门口，由女友挽着，脚踩红毡至正屋之前，同新郎拜天地。新郎先进屋，新娘在门外，双方对跪，新郎用手中的马鞭取下新郎头上的喜帕，这时新娘才初次露面。接着新郎新娘要在灶前对跪，用哈达将羊尾巴投入灶火中，喧“白头皆老”，然后新娘入洞房坐定。直至晚间散席方能下炕。男方必须热情款待娘家客，但为了活跃喜宴气氛，娘家往往挑起“事端”，奥母也

为他们呐喊助威，厨师又故意做“定情丸子”（用线串起来 烩肉丸子）给他们吃，更激起他们的“怒气”，新郎则千方百计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讨得喜欢。但临走时娘家客还是“偷走”新郎家的碗筷，等到车子出门之后才给新郎示看，并拼命驱车赶路，新郎则慌忙地上前拉住车子，唱歌跳舞，作跪礼，这时才肯把碗筷交还新郎，最后还是带走一双筷子和一对碗。婚后第三天，新郎新娘去祭祖，第九天到娘家省亲；满月后，又回娘家过“对月”。这些礼节，建国后逐渐被新式婚礼所代替。

（注：在塔城锡伯族婚礼至今还保留着奥母奥父，娘家客“偷碗筷”等风俗。

在宗教信仰方面同“乌恒、鲜卑、契丹”一样，锡伯族人早期也信仰萨满教，后来他们改信喇嘛教，但很少有人出家当喇嘛。（注：在塔城锡伯族中，建国前只有哈热勒哈勒一人出家当喇嘛，群众称喇嘛达达。）此外，他们修建的喇嘛庙，还供奉关公，周仓的偶像，可见尚未形成统一的宗教。

锡伯族人供奉保佑家庭人丁平安和兴旺的女神“喜利妈妈”，可能是母系氏族社会风俗的遗迹。供奉保护牲畜之神灵的“海尔堪”，可能同乌恒，鲜卑人崇拜瑞兽和神兽有渊源关系。

总而言之，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先后沉浮的东胡，乌恒，鲜卑，契丹，室韦和锡伯是同原异统的。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说前者就是后者，但决不能把后者同前者世代相承的联系割裂开来。

锡伯是锡伯族的自称。锡伯族名，在不同时期的汉文史籍中有矢韦，矢比，西北，席百，席比，斜婆，席帛，锡卜，什伯，实伯，喜伯等不同的译音和写法。

关于锡伯族的来源问题，据《满洲源统考》记载，“太宗

曾诏谕嫩江锡伯说：我与尔先世本是同源。”杨宾在《柳边记略》中也说：“席比自言与满洲同祖。”据此，中外学者将锡伯列入满族的一支进行研究。但事实上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拉拢少数民族巩固本身的统治地位，经常和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说他们的先世本是同源之类的话，而这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也为了本身的利益自与满洲同祖，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锡伯族什么时候怎样到新疆来的呢？明末清初，锡伯族聚居在我国东北嫩江和松花江流域隶属于科尔沁蒙古。康熙三十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古吉等将锡伯人献给清政府编入满洲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分驻齐齐哈尔，伯都纳（今吉林扶余县）和乌拉吉林（今吉林市）三城，隶属于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

清朝统治者害怕“锡伯人众，恐后生事”，采取了“分散各境，万不可使居一国”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康熙四十年（1701）间，清朝政府将三城锡伯族兵丁及其家属一律迁徙，分散到北京，盛京（即沈阳）及其所属各地效力……。到了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盛京各地所属兵丁已超过三千人，连同家眷共计七千八百二十三名，这是锡伯族人的第一次大迁徙。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政府在消灭准噶尔和大小草木之乱后，在伊犁建立了将军衙门。但仍感兵力不足，于是决定从盛京所属十七个城镇，抽调年富力强，善于骑射的兵丁一千。防御、驍骑校各十员，家属三千二百七十五口，共计四千二百五十九人，迁往伊犁驻防。这样就产生了锡伯族人的第二次大迁徙。

乾隆三十年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奏称：“据护送一千名锡伯兵之协领阿穆呼郎噶尔赛呈称：“去岁我等前来时，除已印

册之人口沿途陆续新生男女幼童共三百五十余名。此外，我等于途中救出跟来之闲散四百余名，当即询问伊等，皆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由原籍起程时跟随而来。其中男二百四十七名，女一百五十八名，实际起程跟随而来并无他故。惟印册内无其名额。等因具结前来。”按以上数目计算，当年实际迁到伊犁的锡伯族男女老少，应当是五千零五十名（包括路上死去的和少数外族民众）。起程前，盛京户部支給防御驍骑校各一年俸银外，又拨给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二两，马六匹；发给兵丁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一两五钱；发给每户整装银三十两；应发帐房铁锅之新价银六两以及马六匹，牛三头，车一辆。要求家眷自备两个月口粮，尔后将锡伯官兵及其家眷四千二百九十五人分成两队先后起程。第一队派去防御五员，驍骑校五员兵四百九十九名，官兵之家属共老少一千六百七十五口，一并交协领噶尔赛管代，已于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起程。

锡伯官兵扶老携幼，赶着牛羊离开生活多年的盛京之后，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农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已青草无存，寒气袭人。锡伯官兵携带家属继续前进，于是决定在乌里雅苏台扎营以待来春草木返青再继续上路赶往伊犁。开春时因牲畜长途乘骑驾驱，加之雪厚无草，多半疲惫瘦弱，瘟疫又流行起来。结果由盛京带来的牛三千零三十六头中先后倒死二千五百九十六头，仅剩四百四十六头，马两千零二匹还好些只死了二十多匹，但大多数瘦弱，生赖者多，不得其力。显然，再也不能靠这些牲畜的力量前往伊犁了。经管带协领阿穆呼郎，噶尔赛呈报交涉，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袭扎布奏准“每两户给马一匹，驼一峰计，由此处牧场共拨马五百匹，驼五百峰给之。并令协领阿穆呼郎，噶尔赛将

此马驼沿途妥善饲养使用，抵达伊犁后照数交还”。可见新借给的马驼是暂时使用，若有倒死是要倍价的。

借到马驼的锡伯官兵，每人携带四个月的口粮和一个月的茶叶，仍分两队，于乾隆三十年（1765）三月初十起，先后由乌里雅苏台起程，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连日宿住。等水稍退，并穿绕科齐斯山而行，受困数日，所剩兵丁之口粮只足月余之食，所借马驼也倒死甚多。在粮食将绝，畜力不足，行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阿穆呼郎和噶尔赛没有办法，只好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锡伯官兵及其家眷继续赶路，不久粮食已尽，乃采野菜充饥，勉强走过了霍布克赛尔和察罕俄博。于六月十二至十五日，第一队行至珠尔虎珠、察汗霍吉尔等处，方与前来接济的索伦佐领蒙武哩相遇。第二队行至阿勒坦额赛，沙嘛乌苏等处。与前来接济的侍卫舒敏相遇。两队锡伯官兵及其家眷得到接济后，经过额未勒，巴图鲁克，博罗塔拉等地，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一带。锡伯官兵抵达伊犁时，将军明瑞和参赞大臣爱隆阿尚未确定其驻防、屯田之处所。

乾隆三十年九月，使之进入新疆塔城一带，不久又使之移驻伊犁河南岸。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装备简陋的锡伯族人跋山涉水餐风饮露，横越蒙古沙漠从祖国的东北边疆，迢迢来到西北边陲。锡伯族人民以惊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战胜饥饿、干旱、疾病，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这一历史壮举。在祖国西北边疆扎下了根和当地的兄弟民族一道担负起保卫边疆的重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次大迁徙，是在乾隆三十四年清政府从盛京所属各地挑选四千名锡伯族壮丁运到云南驻防。清政府这种分散各境的

政策，就是造成目前锡伯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历史原因。

新疆的锡伯族，于乾隆三十六年（1767），编为八个牛录，组成锡伯营，驻防伊犁河南岸，进行屯田。他们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家园的。当年他们一到伊犁，清政府随即停止了口粮供应，垦荒开渠也得不到政府帮助。但是勤劳勇敢的锡伯族人民首先修复了旧有的绰尔渠，垦荒一万多亩。然后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土地不够使用，在缺乏口粮、籽种、又不断遭到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为了生计，为了造福子孙后代，锡伯族人民决心开垦伊犁河南岸。经过多次的失败和挫折，在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的支持下，于嘉庆七年（1802），在察布查尔山口开凿了哈尔博户大渠，在塔尔巴哈台开凿了阿布得拉大渠。这样这里原来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良田。从此，哈萨克和蒙古等兄弟民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锡伯族人民在保卫祖国边疆，反对帝国主义颠覆的伟大斗争中，同样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殖民主义者就对我国新疆地区垂涎欲滴，曾指示其走狗，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张格尔进犯新疆。在反对张格尔的斗争中，锡伯族总管额尔图伦率领锡伯族子弟兵八百，远赴南疆，配合清军作战。在喀什浑巴河的决定性战役中，锡伯兵英勇奋战，一举击溃敌兵两万人。一八二八年冬，当张格尔再次进犯我新疆时，张格尔本人也被维吾尔族和锡伯族士兵舒光阿、纳宗阿等人活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沙俄同英国共同扶植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伯，侵入南疆，一八七一年沙皇又直接出兵北疆，占领了伊犁地区。当清朝政府为了恢复失地，分兵三路进军新疆的时候，锡伯族人民纷纷起来参战。在锡伯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援下，到了一八七八年一月，被沙皇俄国侵占十